

# 读西安出土唐姚无陂墓志

张学锋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 南京市 210093)

**关键词:** 唐代; 墓志; 姚氏家族; 贵族政治

**摘要:** 本文在全文释读唐姚无陂志文的基础上, 根据志文中提供的家族信息, 将墓主放在南朝至唐前期吴兴姚氏家族的大环境下, 对姚无陂其人及志文中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阐明了该墓志在唐前期贵族政治、边疆关系、科举考试等研究中的意义。

**Key words:** Tang Dynasty, epitaph, Yao lineage, elite politics

**Abstract:** Based on his decipherment of the epitaph of Mr Yao Wubi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the tomb owner into the context of Yao lineage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 early Tang Dynasty and explain the epitaph's importance in understanding elite politic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文物》2002年第12期刊载了《唐姚无陂墓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 并登出了姚无陂墓志的拓本照片。据《简报》的介绍: 墓志为青石泐成, 盖篆“大周故姚府君墓志铭”9字, 四杀线刻忍冬纹, 志石正方形, 边长53.5厘米, 厚10厘米, 正面阴刻志文共28行, 计665字。此墓为二人合葬墓, 墓主姚无陂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八月卒于雍州乾封县延寿坊里第(今西安市城南), 九月改元即神功元年壬月葬于唐长安城南的奉西(凤栖)原上。姚无陂, 文献无记载。

姚无陂墓志保存完好, 文字基本清晰, 《简报》未录志文, 为便于讨论, 今先试释如下。

## 大周故姚府君墓志铭

大周故平州司仓姚君墓志并序 河东薛撰 君谋(讳)无陂, 某(恐是衍字)字澄之, 吴兴武秦(康)人也。姚墟寅庆, 氤氲岳渎之精; 历岫承家, 赫奕帝王之胤。被乎史谍, 可略而言。

祖思聪, 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行杭州刺史。太伯前基, 延陵旧国, 公肇惟布政, 风化大行, 遂令夜犬不惊, 晨羊罢饮。父憺, 唐绵州神泉县令。俗带岷峨, 人多狡猾, 公示以祸福, 勗以义方, 严其货育之愆, 为立鸡豚(豚)之数。不假褚衣之术, 而贼帅归心。无劳墨勗之科, 而奸雄屏迹。君琼林挺秀, 碧树流芳, 少怀对日之奇, 长具谈天之美。坚贞之节, 不谢松筠, 恭孝之诚, 岂伊桥梓。宝剑出匣, 有难犯之容, 明镜临台, 蕴不疲之鉴。起家左亲卫, 俄迁平州司仓参军事。君执觥进直, 酌酒陈盟, 光动六曹, 声应千里。寻而逆贼李尽灭蚁聚幽营, 鸱张辽碣, 风尘晓暗, 烽火夜明。围逼寇孤城, 向逾旬朔。君烧牛设异, 勗马开奇, 以兹独鹤之才, 还运连鸡之策。羌渠瓦解, 行安勗勗之城。燕将砂崩, 坐复田单之垒。以功特敕加朝散大夫。制曰: 司仓姚无陂, 述

职边城，属逢妖寇，并申忠节，能抗丑徒，危堞既全，濬隍无复，黔黎获义，朱绂方来，宜被恩荣，式甄劳效。昔晋臣告捷，事烈歌钟，吴客凯归，恩覃御盖。比诸宠命，君实兼之。既而石大行危，金丹不就。潘岳八徒，未申吐凤之能，尼父两楹，俄轸哲人之叹。万岁通天二年八月十六日卒于雍州乾封县延寿坊里第，春秋六十有五。即以神功元年正月五日归窆于城南奉西之原，礼也。右黄中，播美得君子之嘉；京兆猷丹，义驰芳蕴贤士之令望。固以忠而奉国，孝以承家，倜傥文锋，纵横武略，方冀荣迁九棘，任烈三槐，而天不义遗，奄然薨歿。长康流恻，叹鱼鸟之无依。伯牙绝弦，枪音晖之永昧。嗣子某乙，柱国常选大礼等。克隆堂构，郑公叶之不亡。果绍家声，苟令君之柱国。天官常选大礼等，不死诗礼之诮，没齿无闻。蓼莪之痛，终身永结。崩心泣血，愿题无愧之词。撰德书功，式表显亲之范。其词曰： / 蝉联茂绪，赫奕衣簪。涂山执玉，闾阖义金。白城播誉，三叹流音。祖德逾远，家声不。其一惟君积善，夙承余庆。朝野羽仪，人伦镜龟。凛凛志节，雍雍词令。足不蹈制，心恒履正。其二随班远郡，述职边亭。事无私曲，言必公平。凶渠屡扰，妖寇频经。固此危堞，还义城。其三义义西景，森森东流。一从过隙，空怆藏舟。萧条陇树，寂寞荒丘。桂月恒静，松风镇秋。

（泐字用 表示， 表示另行。志文中的日、月、年、天、正、国等武则天文字及部分异体字均已改成通行字体。括号中为作者校语。）

姚无陂，文献中虽不见记载，但从墓志留给我们的信息中，仍然可以找到很多线索。以下，我们想围绕着姚氏家族、姚无陂本人以

及墓志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 一、姚无陂所属的姚氏家族

姚无陂墓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其籍贯和祖父的名讳。志称无陂“吴兴武秦人”，“祖思聪，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行杭州刺史”。吴兴郡无武秦县，“武秦”乃“武康”之误，姚氏是南朝以来吴兴武康著姓。梁陈隋唐初姚氏最著名者可数姚僧垣及姚察、姚最兄弟和察子姚思廉。僧垣传见《北周书》卷四七、《北史》卷九，姚察传见《陈书》卷二七、《南史》卷六九，姚最传附见于僧垣传，思廉传见《旧唐书》卷七三、《新唐书》卷一

二。僧垣、最父子擅长文学、医学，见著于周隋二代。察、思廉父子，皆以文史见长，撰著《梁书》、《陈书》。尤以思廉在唐太宗时期的活动为最，形象列于“十八学士图”，文学褚亮为之赞。无陂祖父名思聪，据《新唐书》卷七四下《宰相世系表》姚氏，思聪为姚最之子，则思廉、思聪互为从兄弟。无陂为思聪之孙，思廉之从孙，属吴兴姚氏家族成员，其社会地位亦可窥知一斑。

虽后世追述僧垣八世祖姚信是孙吴太常卿，但吴兴武康姚氏两晋时期几不见史籍。刘宋元嘉末年有吴兴姚峤者，颇知吴郡、吴兴、晋陵、义兴四郡水利事，扬州刺史刘浚曾上书请求按姚峤的建议动用乌程、武康、东迁三县民工从武康义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事见《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在上书中，刘浚称姚峤为“州民”。看来当时武康的姚氏尚处于封山占水、增扩庄园的开发领主阶段。在刘宋历史上登场的并能够基本上确定为武康姚氏的还有姚系祖（《宋书》卷四八《朱龄石传》）、姚宏祖（《宋书》卷八四孔凯传）、姚天覆（同前）、姚道和（《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卷八四《孔凯传》）等人。其中姚系祖“武康人”，“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

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系祖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处途径，乃邀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乃率吏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莫有得举手者，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清。”此事在当时影响颇大，朱龄石还一时为人所劾，系于狱中。其在狱中一心诵念观世音最终得免的故事为陆杲编集的《系观世音应验记》（抄本藏日本京都青莲院，中华书局1994年标点本）所录。此外，姚宏祖、姚天覆、姚道和亦属行伍，姚道和还在长江中游响应沈攸之举兵反抗朝廷。可见武康姚氏在刘宋时宗族强盛，具有军事强宗的性质，这一点与同郡同县的沈氏有着相同之处，是有别于吴郡顾张朱陆、会稽贺孔虞魏等教养贵族的又一类江东豪族。直至陈后主时姚察还称自家为“东皋贱族”（《陈书·姚察传》），这当然是姚察力辞选举之任时的托词，但另一方面武康姚氏也确有“贱族”的过去。

武康姚氏以教养文人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始于萧梁时期的姚僧垣，即姚察、姚最的父亲。僧垣知名梁武帝时，“二宫礼遇优厚，每有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陈书·姚察传》）。有意识地将姚察、姚最兄弟培养成文学教养之士，这也是历世不衰的贵族家庭成长的必经之路。僧垣在梁元帝即位以后携次子姚最随朝士共赴江陵。江陵沦陷后父子被带往长安，以医学见著于周隋，僧垣累封北绛郡开国公，死后由姚最袭封。姚最为蜀王杨秀司马，因杨秀被废黜而坐诛。入唐以后姚最一支在其子思聪以后人物不如姚察一支繁盛。而姚察入隋以后被誉为江东学行的代表，并受封了姚最转让的北绛郡开国公。其子思廉入唐拜散骑常侍（从三品文散），封丰城县男（从五品上爵）。思廉孙璿至高宗武则天时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封吴兴县男（从五品

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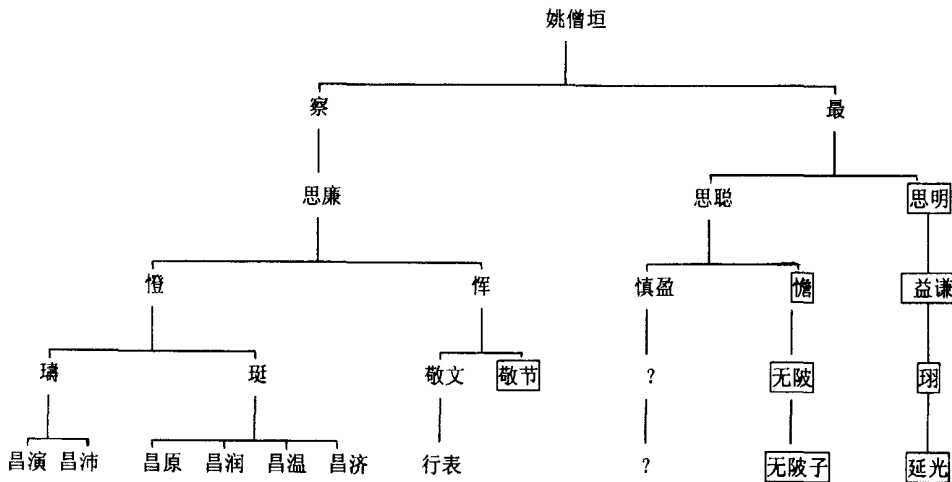
《宰相世系表》称姚最子思聪官左庶子。左庶子为东宫职事官，正四品上，此外不载。据姚无陂墓志，思聪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还曾使持节杭州诸军事、行杭州刺史，表志可以互补。杭州，新、旧《唐书·地理志》均定为上州，疑是开元天宝以后的事，初唐时恐未必如此。唐制上州刺史从三品，而思聪“行杭州刺史”，唐代官僚散阶高于职事官品时职事官名前加“行”，故杭州刺史不及从三品。唐代重视散品，它是贵族官僚在国家政治社会中身份地位的象征，一至三品、四五品、六品以下这三个等级之间在禄俸礼秩上有着明显的差别，思聪是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属于高级官僚。据《大唐故朝议大夫上柱国杭州长史姚（璿）府君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思聪之外，姚最尚有思明一子，相关考证请参见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姚氏条所引。

无陂父璿，史籍不载，据姚无陂墓志，曾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东）神泉令。绵州有神泉县，姚璿之名与思廉、思聪诸子同属心部，可确信。神泉令在六、七品之间，姚璿未能跻身高官行列。吴兴姚氏自僧垣以下五代请参见“姚氏五代世系表”。

姚氏尚有另外一支，其代表人物即历任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著名宰相姚崇。姚崇与思廉孙姚璿在则天朝先后为相。姚懿、姚崇父子与思廉、思聪兄弟之间的亲属关系虽不得详悉，但作为同属武康的姚氏，在门第郡望观念仍然浓重的唐代前期，两支之间必定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相互声援或是意料中事。

## 二、姚无陂其人

无陂卒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卒年65岁，则其生于贞观六年（632年），是时思廉、思聪兄弟尚在，无陂即降



世系表主要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制成，加框者为笔者所补，其中慎、无陂、无陂子据姚无陂墓志，敬节据《旧唐书·姚璿传》、《新唐书·姚思廉附孙璿传》，思明一系据《大唐故朝议大夫上柱国杭州长史姚（璿）府君墓志铭》（开元廿三年）补。

生在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的显赫家庭。无陂本人的仕历，据墓志称“起家左亲卫，俄迁平州司仓参军事”。左亲卫是唐代的三卫（亲卫、卫、翊卫）之一，是专为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在太学学习结束到正式任官这一段时期内准备的职务，参与天子宫闱的警卫任务，可以说是正式任官前的准备阶段。“起家”即初任，是六朝以来贵族子弟从此跨入官僚行列的专用词。墓志所记姚无陂父亲的职事官在六品以下，散官品阶不详，可知无陂或是承其祖辈的门荫（思廉、思聪均为从三品文散）降一等入太学学习的（三品以上官僚的子孙通常应在弘文、崇文二馆或国子学就学），学业结束后与众多的贵族子弟一样充当亲卫，等待正式的任命。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司仓是州一级诸司参军事之一。平州为下州，司仓参军事为从八品下。从“俄迁”一词看来，无陂在任左亲卫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平州司仓了，但万岁通天元年即其死去前一年他仍然在这一职位上。要么他出太学或任左亲卫时年纪已很大，要么在平州司仓任上历时年久，两者必居其一，无论如何这在当时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因无其他史料参照，详情不得而知。

姚无陂一生中值得圈点的事件就是参与平定李尽灭一事，志文中为此也大费了笔墨。李尽灭本名李尽忠，是营州契丹部首领，曾被唐朝任命为松漠都督。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因不堪唐营州都督赵璿的侵侮，与姐夫孙万荣一起举兵反唐。“则天怒其叛乱，下诏改万荣为万斩，尽忠为尽灭。”（《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之契丹条）这次反唐军事行动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唐朝为此动用了数十万的军队，损兵折将，连战连败，这在唐代对周边民族关系上是一件重大事件。姚无陂墓志中称其以模仿齐将田单的“烧牛”、“璿马”奇策，攻破了契丹军据守的孤城。或是无陂参与的这一军事行动有其特殊意义，因此加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文散阶），武则天特地下制书予以褒奖。此年的五月李尽灭、孙万荣的反唐起义被平定，政府制书褒奖当在这以后不久，八月姚无陂即死去。其间只有短短数月，姚无陂的死因或许与这次战事有关。

唐制诏敕的种类大体有册书、制书、敕书三类。三品以上用册，五品以上用制，六品以下用敕。在官吏任免上，前二者权在宰相，后者权在尚书省吏部和兵部。志文中所

称“制曰”，与无陂的阶官朝散大夫相应。又，唐代官僚死亡，三品以上用“薨”，四、五品用“卒”，六品以下用“死”，志文称其“卒于雍州乾封县延寿坊里第”，此亦与其朝散大夫相应。可见，姚无陂墓应该是按照从五品的等级下葬的。

唐代的墓葬有着比较严格的等级，官僚墓葬的等级也基本上是上文提到的三等，这在开元以前律令制度比较完善的时期表现尤其明显，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的唐墓也基本上能够反映这一历史。据《简报》，姚无陂墓为长斜坡土洞墓，水平残长 19.72 米，方向 185°，三个天井，三个过洞，两个壁龛，墓室呈正方形，边长 2.6 米左右，甬道偏于墓室东侧，棺床紧靠墓室西壁。墓葬形制和规模与景龙三年（709 年）朝散大夫独孤思敬夫妇合葬墓（《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几乎一致，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四五品官员墓葬的典型。

### 三、志文中姚无陂的籍贯问题

志称姚无陂“吴兴武秦人”，如前所述，“吴兴武秦”乃“吴兴武康”之误。《旧唐书·姚思廉传》称：“姚思廉字简之，雍州万年人。”万年即西京长安朱雀街之东。《新唐书·姚思廉传》称：“陈亡，察自吴兴迁京兆，遂为万年人。”可见隋平陈以后姚察一支即迁往关中落籍京兆万年县。姚察移籍京兆万年县，一方面是随了隋唐高级官员任京官移籍两京的潮流，另一方面则与其父姚僧垣有关。姚僧垣死时隋尚未平陈，死后当葬在长安。因此推测陈平以后姚察不是将僧垣墓迁回武康旧茔，而是举家移籍京兆。这无疑也是隋文帝削弱江南政治势力巩固统一政权的一项举措。姚察卒于东都洛阳，死前嘱咐薄葬，送厝旧茔北。旧茔当指僧垣之冢，在长安。

姚察一支既已如此，姚最一支则更不待说。《北周书》、《北史》姚僧垣传载僧垣往

赴江陵时携次子姚最同往，江陵破后，父子被周军带往长安，最时年十九岁。入隋后父子落籍长安当为无疑，如此，姚最、思聪一支在户籍上的籍贯应是京兆府，则无陂亦当为京兆人无疑。

志称无陂“吴兴武秦（康）人”，这样的说法在唐代不足为怪。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夸伐门第，而门第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郡望，贵族成员如果失去了世代相续的显赫门第，则无法立身处世，这一点无须赘言。但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对贵族官僚原籍任用制有了限制，因此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官员移动，特别是在两京任职的高官，很多都离开了原籍地，将籍贯移到了东西两京。虽然如此，但都还念念不忘自己家族百十年来的根基所在，尤其是在与个人有关的碑铭行状之中，使用旧籍的现象非常普遍。姚氏家族亦不例外，姚璿被封为吴兴县男就是其例。又如姚崇，两《唐书》本传均称其为陕州硤石（今河南浍池西）人，而开元四年（716 年）姚崇子姚彝死后崔沔为他撰写的《大唐朝议大夫光禄少卿虢县开国子吴兴姚府君神道碑》（传世碑文可参照《全唐文》卷二七三，碑刻录文可参照《金石萃编》卷七十一）中则径称为“吴兴姚府君”。此类事例为数尚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姚无陂卒于雍州乾封县延寿坊里第。乾封县，《新唐书·地理志》京兆府条：“长安，赤。总章元年（668 年）析置乾封县，长安二年（702 年）省。”乾封县即是朱雀大街西部原长安县的一部分，存在年数仅 34 年，县廨在怀贞坊东北隅。无陂卒于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正是乾封建县的时期。延寿坊，朱雀门街西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街西从北第五坊，位于西市与太平坊之间，即今西北大学之西。长安城内的两条主要水道永安渠和漕渠在此交汇，故有池水之美，是长安城中高级官僚卜宅的胜

地。与姚无陂几乎同时代的礼部尚书裴行检宅就在延寿坊，史称“土地平敞，水木清茂，为京城之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姚无陂宅在延寿坊，亦可推想其家族之名望。若此处为姚最、思聪以来的旧宅，则其籍或为京兆长安县，与姚察、思廉一支隔朱雀街而居。

#### 四、姚无陂葬日所反映的武周纪年

志称姚无陂卒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八月十日，葬于“神功元年<sup>①</sup>月”。《简报》释为“神功元年壬月”。“壬月”意义不明。据志文，此处的“<sup>①</sup>”实是武则天文字“正”字。如此则无陂葬于神功元年正月。然万岁通天二年九月“以契丹李尽灭等平，大赦天下，改元为神功”。（《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它书均同）因此，神功元年是从小岁通天二年九月开始的，数月后又改元圣历，不应有神功元年正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以后，于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一日改历法，用周正。“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通鉴》卷二 四永昌元年）。久视元年（700年）十一月改回，共使用了11年。又据《通鉴》卷二 六神功元年闰十月条后称：“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历官原是定这一年的闰十月为正月的，武则天为了能使正月初一与冬至同在一天，硬是改了历法。原本是夏历十一月的正月变成了闰十月，原本是夏历十二月的腊月变成了正月。从而，姚无陂的葬日则应是这一年的夏历十二月。而周正的正月朔日已经改元为圣历元年，因此，按周正应是圣历元年正月五日。姚无陂死的这一年多次改元，又变历法，给人们造成了混乱。

不过从姚无陂的葬日考证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武则天改十一月为正月，但传统的年节恐怕依然按夏历来过。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正的“正月”仍然是一年中未完的月份，而新的一年则应该是从周正的“春一月”开始，可见传统与习惯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

#### 五、关于“天官常选大礼等”

志文中言及姚无陂嗣子，未具其名字，代以“某乙”。两处称其嗣子为“柱国常选大礼等”、“天官常选大礼等”。柱国，唐<sup>②</sup>官从二品。<sup>③</sup>官原来是加给有军功者的恩典，但随着对外征伐的增多而滥发，最终甚至连一介兵士都能得到上柱国（正二品）的<sup>④</sup>官。姚无陂嗣子的从二品<sup>⑤</sup>官恐亦难免滥授之嫌。而比较难懂的是“大礼等”一词。

“天官常选大礼等”。志文中“天”作武则天文字。天官即吏部，武则天时依《周礼》改。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由吏部掌选举。偃师杏园唐墓 M1710 李<sup>⑥</sup>墓志（开元六年，《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中有“宿卫吏部常选”是另一例。又，《大周故杨君墓志之铭》（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称墓主“唐显庆中，明经擢第。拂衣高蹈，习前代之风，每有常调，皆无赴集”。“常调”与“常选”都与吏部（天官）例行铨选人物有关。只是“大礼等”颇为费解。作为推测之一，“大礼”只是吏部的一种差遣，在国家举行“大礼”时被调用，“等”是等等，表示多数之意。作为推测之二，“大礼等”或许与科举选人有关。据《新唐书·选举志下》，唐代在贡举合格者中选择官僚时有四种选择标准：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猷美；四曰判，文（下转 107 页）

- [12] 明经世文编·余肃敏公文集（卷六一）. 北京：中华书局，1962：489.
- [13] 明经世文编·史督抚奏议（卷一六六）. 北京：中华书局，1962：1689.
- [14] 明史·兵四（卷九二）.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58.
- [15] 明史·食货三（卷七九）. 北京：中华书局，1974：1925.
- [16] 魏焕·皇明九边考·镇戎通考（卷一）. 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79）. 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65.
- [17] 明史·兵四（卷九二）.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4~2265.
- [18] 明宪宗实录（卷三四）. 上海：上海古籍社，1983.
- [19] 明经世文编·史督抚奏议（卷一六六）. 北京：中华书局，1962：1689.
- [20] 太白阴经·烽燧台篇第46（卷五）.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726）.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
- [21] 转引自罗哲文·长城.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65~66.
- [22] 戚继光·纪效新书·守哨篇（卷一七）. 见：中国兵书集成（18）.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5：583~584.
- [23] 魏焕·皇明九边考·镇戎通考（卷一）. 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79）. 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65.
- [24] 明经世文编·马端肃公奏疏一（卷六二）. 北京：中华书局，1962：509~510.
- [25]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宁庐安（第8册）. 见：四部丛刊. 上海：上海书店，1985：60.

（责任编辑：辛 革）

（上接 102 页）

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其中“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因此，“大礼等”或是因文理优长而“入等”者。那么“大礼”又如何理解呢？唐制，除每年的常选诸科之外还有制举（又称制科），天子为了获得非凡的俊才，不定时地诏令选人，所谓“博学宏辞科”、“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道侔伊吕科”等均属此种，名目极其繁多。在众多的制科中有一科被称作“大礼科”。“大礼科”不常见，据徐松《登科记考》的整理，仅见于武后时期的两次，一次是永昌元年（689年）的“明堂大礼科”，一次是天册万岁二年（即万岁登封元年、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的“南郊大礼科”，均简称“大礼科”。看来“大礼科”均是与国家举行大礼有关，从中亦可见武则天时期政治形势之一斑。具体到姚无陂嗣子，从志文的行文来看，因文理优长“入等”天册万岁元年的“南郊大礼科”的可能性更大，若是，则在其父死前一年。

如果将“大礼等”与科举制联系起来，则志文中的“常选”是否与“常举”之类的术语有关呢？常举是指原则上每年举行的贡举，科目有进士科和秀才、明经等诸科，而“大礼科”等临时诏选的应该称为“制科”或“制举”。志文中用“常选”，不知何故。或许是因为武则天以后制科常开，几乎无年不选，在当时人看来已同常选之故。

以上对“天官常选大礼等”的解释只是一种推测，作者本人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希望能有更贴切的解释予以指导。

以上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最近西安出土的唐姚无陂墓志。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姚无陂其人放到六七世纪的姚氏家族以及更广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考察，如此，姚无陂墓志也就不单单是一块文物意义上的墓志了，其在隋唐贵族制、科举制、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以及对周边民族关系等研究领域的意义也就凸现出来了。

（责任编辑：辛 革）